

峨眉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梅： 创作为本、产业为基 做强做优峨影全产业链

■文/本报记者 李露钧

由峨眉电影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已于8月8日全国上映,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影片通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视角来切入,探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然胜利的密码。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峨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影片总制片人韩梅。她表示,希望通过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告诉今天的人们,新中国是怎样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历史担当,让年轻观众身临其境走进历史,去了解和感受革命先辈们满腔的热血豪情,回顾那段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

近两年,峨影集团先后推出了《十八洞村》、《家园》、《大路朝天》等多部优秀影片,取得良好社会反响和口碑,并参与投资了出品了《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中国机长》、《芳华》、《找到你》、《破门》、《周恩来回延安》、《第一次的离别》、《大河唱》等作品。韩梅表示,在2018年举行的峨影6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中,进一步明确了“创作为本、产业为基”的发展思路,确定了“峨影再出发,构建影视全产业链旗舰集团”的战略目标:“依靠内容驱动、资本撬动、科技推动,做强做优峨影全产业链”的战略思路,构建创作拍摄、投资融资、技术支撑、发行放映、峨影文化等“五大体系”的战略布局,推出一批具有中国风格、四川元素、巴蜀特色的影视佳作。

《红星照耀中国》激励青年一代 充满奋进激情,用青春书写芳华

《中国电影报》: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已于8月8日全国上映,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峨影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为何选择这一题材的作品来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韩梅:创作拍摄电影《红星照耀中国》,既是峨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现每年至少生产一部有分量主旋律影片的又一次实践,也是峨影作为国有电影企业的责任担当。我们希望通过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告诉今天的人们——新中国是怎样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历史担当。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故事内核来源于埃德加·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讲述了埃德加·斯诺冒险深入到“红色中国临时首都”陕北小镇保安,在面对面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不仅领略到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信仰,还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次把“红色中国”推介给全世界,并发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历史性预言。

选择《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电影作品来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是因为它不仅能够让我们回顾过去、铭记历史,提醒我们的党员队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能激励我们的青年一代,充满奋进激情,用青春书写芳华。这也与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精神相呼应。

探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必然胜利的密码

《中国电影报》:《红星照耀中国》为何要选择从一个美国记者的视角进行切入?影片所表达的主旨是什么?

韩梅:选择埃德加·斯诺的视角来切入,不仅因为他作为美国记者的身份能够客观、公正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还因为他在深入革命根据地之后,基于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从百姓中来,成为人民选择的领导人,又如何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信仰贯彻始终。1937年,由埃德加·斯诺撰写并配有大量现场照片的书籍——《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英国出版,销量立即达到创纪录的数十万本,产生了轰动性的新闻效果。这本书是斯诺在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后,用第一手材料写出的不朽著作。斯诺用他客观公正的语言,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红军,让世界乃至中国民众,更加了解共产党,更加了解中国本身。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用讲述历史的方式,通过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探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然胜利的密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下。一个一心为人民、有伟大理想的政党,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险阻,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这就是我们想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向大众传达的核心精神。

让年轻观众身临其境走进历史 感受革命先辈们满腔的热血豪情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影片会给当下的青少年带来哪些启迪?

韩梅:《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影片对于年轻一代,尤其是当下的青少年来讲,最重要的是能够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现在的青少年大都是00后出生,诞生在网络化信息社会的他们,生长环境总体来说是非常优越的。对于这些青少年而言,几十年前革命先辈们所经历的那些艰难险阻是他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他们或许在课堂上通过图片与文字的形式,对那段历史有过一些了解,但课本内容的表现形式相较于影视作品的代入感要强一些,较难吸引这些青少年去深入了解。

而《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影片恰好通过电影这种艺术的表现手法,把这一段重要的历史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广大青少年的眼前,让他们有机会身临其境走进历史,去了解和感受革命先辈们满腔的热血豪情,回顾那段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这种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平日被娱乐新闻以及各式新潮电子产品所包围的青少年们来说,是非常具有震撼力,并能够触及心灵深处的。只有让广大青少年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认可,才能更好激励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学习乃至工作中敢打敢拼、不断奋进,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添砖加瓦。

坚持内容驱动、创作为本 按照“1+X”创作思路抓好影视创作

《中国电影报》:峨影集团近年来拍摄了《十八洞村》、《大路朝天》等一批优秀的主题主旋律电影。在坚守主旋律阵地,拍摄“两个效益”双丰收的精品佳作上,峨影有哪些心得体会?接下来还有哪些作品即将推出?

韩梅:我们坚持内容驱动、创作为本,按照“1+X”创作思路抓好影视创作,即每年主创一部以上的重点题材主旋律影片,并参与投资出品商业电影,推出一批影视佳作。在主旋律影片创作上:2017年,主创主投《十八洞村》取得良好社会反响和口碑,与《家园》一起被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十九大重点献礼影片,并获得第17届华表奖优秀影片、优秀编剧、优秀女演员奖等大奖,入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2018年,主创主投影片《大路朝天》被中宣部电影局列为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影片;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正在热映之中,影片获得业内专家、专业影评人以及影片人物原型后代、各大媒体的高度赞扬。

在参与类型化影片的出品方面,从2017年以来,先后参与投资出品《芳华》、《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中国机长》、《找到你》、《破门》、《周恩来回延



安》、《第一次的离别》、《大河唱》等30余部影片。近三年主创和联合出品影片共有26次获奖,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通过近三年的尝试和探索,我们深切体会到,按照新时代电影创作的新要求,要更加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汲取营养,生产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主食”。以此为遵循,坚持内容驱动、创作为本,传承弘扬峨影现实题材创作优势,聚焦影片生产主业,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履行国有电影企业的使命担当。

未来三年,峨影集团将继续抓住重大时间节点,提前精心策划,推出精品电影:2020年拟拍摄以“时代楷模”其美多吉为原型的《巴乌,巴乌》(藏语:英雄),反映凉山全面奔小康题材的影片《五彩云霞》;2021年拟筹拍向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信仰的味道》等重大主旋律题材。同时,不断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当代价值,正在筹划拍摄重点题材“战时故宫”故事片,以四川历史文化名人杜甫为题材的动漫电影《夏王》、外国人看苏东坡的纪录电影《一念桃花源》等影片。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中国电影报》:在对接主流市场层面,峨影集团投资了如《流浪地球》、《中国机长》等作品。作为国有电影集团,在商业片的项目选择上,峨影有哪些标准?

韩梅:我们在商业影片的选择上,主要是从两个层面评判:一是内容和创作层面,主要看剧本故事、主创团队、情感共鸣等。在剧本故事上,坚持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导向,注重选择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题材;在主创团队上,主要看编剧、导演和影片拍摄制作等方面的把控能力。二是市场层面,主要看观众跨度、市场同期情况、开拓性判断等。具体来讲,比如积极参与头部影片的摄制,比如《红海行动》、《流浪地球》、《中国机长》等。又如坚持民族文化的传承,联合出品了《第一次的离别》、《大河唱》、《寻梦》等影片,从已上映影片看,大多取得了不俗的口碑和不错的票房成绩,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依靠内容驱动、资本撬动、 科技推动,做强做优峨影全产业链

《中国电影报》:2018年是峨影集团成立60周年,在您看来,该如何借此契机,实现峨影的进一步跨越发展?

韩梅:2018年,集团成功举办峨影6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回顾峨影60年光辉历程,进一步明确了“创作为本、产业为基”的发展思路。确定了“峨影再出发,构建影视全产业链旗舰集团”的战略目标:“依靠内容驱动、资本撬动、科技推动,做强做优峨影全产业链”的战略思路,构建创作拍摄、投资融资、技术支撑、发行放映、峨影文化等“五大体系”的战略布局,推出一批具有中国风格、四川元素、巴蜀特色的影视佳作,打造一个符合当代电影工业化生产的影视产业园,搭建一个以影院资产为核心的上市平台,建设一座以峨影电影大厦为核心的影视文化消费园区等“四个一”战略重点,加强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两个”战略保障,聚力抓好影视创作、资本运营、项目建设、文化交流、改革转型等重点任务,为电影强国建设做出峨影人的贡献。

以红色之名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3月,连绵阴雨笼罩着香港。启程前,汤溪已经有了打算,去香港影视展搞个“壮举”,事先不跟任何人打招呼。

汤溪的“壮举”在这个亚洲最大的国际影视展开幕当天“打响”:一幅长7.9米、宽5米的巨型红色海报高悬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最显眼的位置上,海报上,毛泽东和斯诺前后而立,“红星照耀中国”六个大字赫然在目。汤溪远远看到,来来往往的中外来宾,正在排队跟这部献礼新中国70周年的红色电影的海报拍照合影。“这次,我又坚持对了”,汤溪有些兴奋。

汤溪是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的制片人兼编剧,两年前,她和爱人王冀邢导演启动了电影版《红星照耀中国》,自此,劝他们放弃的声音便成了二人听到次数最多的“意见”,让他们更加始料未及的是,日后的筹拍之路,几近演变成了一场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徘徊的拉锯战。

被“点燃了”

王冀邢记得,自己小时候第一次看《红星照耀中国》,就被它“点燃了”。当导演30多年来,几乎平均每隔10年,王冀邢就会有一次想把这本书搬上银幕的冲动。

两年前,汤溪的这次香港之行,让王冀邢最终下了决心。

2017年3月,汤溪跟着代表团去了次香港国际影视展,回来后,她告诉王冀邢,影视展上满眼都是娱乐片,“几乎每一部都是”。

汤溪的香港见闻,刺痛了有着40多年党龄的导演王冀邢,他跟汤溪商量,要拍《红星照耀中国》,现在就拍。

王冀邢毫不掩饰《红星照耀中国》的电影属性——“它就是政治片。它不是讲戏剧冲突、设置悬念、儿女情长的那类片子,它是讲思想讲政治的意识形态影片”。

在评论家眼中,王冀邢是一位有社会担当的导演。中国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曾评价王冀邢说,他是一个能看到社会问题,并能针对问题做有责任的表达的导演。

上世纪90年代,王冀邢以电影《焦裕禄》闻名影坛,这部英模电影不仅塑造了朴实的人民公仆形象,还首次在银幕上直击如“逃荒要饭饿死人、买高价粮”等社会问题。

这些年,王冀邢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无法压抑的焦虑,他发现,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涌进大量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有人被“洗了脑”,有人开始歪曲历史、抹黑英雄人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王冀邢说,就是要拍一部拯救灵魂的政治电影,“这部电影要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

作为制片人,汤溪心里清楚,指望《红星照耀中国》赚钱,可能性太小了,她有劝王冀邢放弃的想法,“一开始,我其实是不赞同,原因很简单,确实有风险嘛。”

争论过后,汤溪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被王冀邢“点燃了”。“他说,电影的使命不只是一个娱乐的工具,还要有社会责任担当。现在中国需要这样的电影,接不接受是观众的事儿,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拍不拍是他的事儿,有这么一部影片在,他就能影响人,只要上映了,能影响多少算多少。至少有两种人应该看,一是共产党员,二是青少年。就是这句话,彻底说服了我,增强了我的信心。”

四处碰壁

《红星照耀中国》注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项目刚刚启动,就陷入了“找不到投资”的困境。

汤溪带着PPT在各大电影节“碰机会”,约访各大电影公司、投资人,一圈儿跑下来,大家的态度如出一辙,“项目是个好项目,但是难度大,不好做。”没有人愿意去冒险,投资人们默契地以观望态度婉拒了汤溪。有说话直接的,当场就问汤溪,你怎么不去做像《战狼2》这样赚钱的项目?

转机出现在汤溪见到峨影集团董事长韩梅之后,“直到现在,我还是

特别感谢峨影,感谢韩董事长”,汤溪知道,当时也有影视界“权威”劝韩梅不要介入,他们的意思是,资金不够、人员不够、时间不够,各种条件都不够,肯定拍不成,不要往里面砸钱了,毕竟峨影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电影厂,而且已经有好几个项目同时在做了。

韩梅顶着各方的压力找到汤溪,问她,你们自己有没有信心?汤溪向韩梅打了包票,韩梅给了汤溪第一笔启动资金。拿着峨影给的钱,汤溪开始了新一轮融资,后来,绿地控股、四川新文广、西安嘉方、四川宜宾五粮液相继加盟投资阵容。

然而《红星照耀中国》的筹拍之路,远不是有了拍摄资金就能“万事大吉”的。汤溪回忆,影片光是立项就用了半年多时间,“当时几乎是每个星期都在打听”。

即使在立项过程中,依旧有人旁敲侧击劝汤溪放弃,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剧本没有戏剧性、没有人物变化、拍出来不会卖座,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面对汹涌的“劝退”声音,导演王冀邢说了一句在汤溪看来特别“悲壮”的话,“一年拍七八百部娱乐电影,怎么就不能允许一部这样真实的红色电影诞生呢?”

三个月不拿一分钱工资

回首《红星照耀中国》两年筹拍之路,有坎坷,也有温暖。

《焦裕禄》上映近30年后,李雪健与王冀邢再度合作,首次在银幕上出演鲁迅,李雪健回忆说,虽然只有一场戏,但还是诚惶诚恐,“我问导演说,我行吗?导演说你行。这个‘行’就让我想起来当年拍《焦裕禄》的时候,焦裕禄在我心目中是父亲般的榜样。我说我行吗?王冀邢导演说你行,我就有机会演了。”

除了李雪健,蒋雯丽、李幼斌、果靖霖、小沈阳、孙浩等影视明星也纷纷加入剧组。

剧组幕后工作人员同样暖心,由于拍摄资金紧张,拍摄期间,每笔到账的钱,都会紧着拍戏,一度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幕后人员没拿过一分钱工资。没有人抱怨,大家依旧一心扑在拍摄上,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还是将电影成片拍出了大片质感。

电影关机那天,《红星照耀中国》剧组评选了26个创造奇迹的人,汤溪说,自己特别感谢来自峨影的这些幕后英雄,是他们创造了奇迹。作为制片人,汤溪却有些自责,“要是能再多找2000万,多给一些时间,影片还能拍得更好。”

一稿剧本写了15万字

之所以30年后,王冀邢才有把握拍摄《红星照耀中国》,用他的话说,是因为找到了“一双斯诺的眼睛”。

无论是1987年,还是1997年“动心”后的放弃,王冀邢坦言,说到底,没有找到能说服自己的拍摄方式和切入点,他不想拍成伪纪录片,二不想依靠虚构情节拍成所谓类型片。

再次启动《红星照耀中国》,王冀邢决定,抛开先入为主的“人设”,找一位非党员的职业编剧创作剧本,自己只负责导演工作。

在他的预想中,编剧本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不是共产党员、要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同时具备扎实的写作能力,王冀邢说,他就是想要找一双如当年斯诺一般的“眼睛”,以客观公正的第三者立场,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下,汤溪同时承担着制片人和编剧两项工作。

王冀邢对剧作的要求很高,他要求剧本要完全尊重历史,不能为了戏剧冲突编造情节,剧本里每一处史实性事件,历史名人说的话,都要在史料里找到出处。

对党史缺少研究的汤溪,在此后四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埋进党史里,先啃完三个版本的《红星照耀中国》,又研究起斯诺的个人经历,翻阅了所有中外作者撰写的毛泽东传记,也看了影响了毛泽东的书,还找来了《共产党宣言》原文。

第一稿剧本,汤溪写了15万字,长度接近4部剧本篇幅。剧本中每一个历史人物,每一处历史事件,汤溪都标记了出处,尽量以客观的史料还原历史。

电影里,陈友仁的辞职,蒋介石一脸厌恶说出“讨厌的人民”,斯诺向鲁迅、宋庆龄询问红军,毛泽东对斯诺讲述自己的生平,斯诺跟着红军上前线……

“电影里,任何一个历史的事件,历史人物都是有据可查,有史可见的。”汤溪说。

电影上映后,没有历史学家针对影片涉及的历史问题提出任何异议。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用了“精准”二字给了电影极高肯定。

也有观众对影片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台词、旁白过多,王冀邢说,“作为史诗性、纪实性、政论性的政治影片,不让人物讲话,怎么体现影片的观点和思想?”

有人批评影片结尾,斯诺和毛泽东一起走向人民纪念碑是“时空穿越”,王冀邢笑言“远不是那么简单,其实极具现实意义。中国从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变成今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证了斯诺结尾所说的‘红星还会照耀世界’的判断”。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首次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红军领袖。这部报告文学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几乎传遍全世界。

在汤溪看来,《红星照耀中国》的电影,一如80多年前,传遍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书籍一样,也在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今年,汤溪带着《红星照耀中国》又去了一次香港国际影视展。出发前,有人提醒她,不要在香港突出影片《红星照耀中国》属性,他们担心,这样的宣传可能会影响影片的海外销售。

“我就不信这个邪!”汤溪有自己的坚持,她想不通,自己拍了一部堂堂正正的献礼片,心里坦坦荡荡,还没给人家看,怎么就知道海外观众一定不爱看?怎么就断定,红色电影一定没有海外市场?

汤溪自己拿了主意,做了一幅长达7.9米的《红星照耀中国》巨型海报,挂在展馆中人流密集的位置,又拉了一幅2.9米的海报在自己的展位上。

开展那天,巨型海报下,挤满了要跟海报合影的中外嘉宾,展位前,许多路过的外国参会嘉宾一眼认出了海报上的毛泽东形象,他们聚在汤溪的展位上,咨询影片制作进度。电影的红色纪念章也成了抢手货,有些外国嘉宾为了换到一枚纪念章,现场跑去打印店换了名片,拿来交换。

看起来来来往往的中外嘉宾热烈的讨论着《红星照耀中国》,汤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把中国故事讲到世界,才是这部红色电影应有的格局”。